

中國共產黨歷史論義

(試用本) 第三冊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试用本)

第三册

湖南师院 北京师院

上海师院 江西师院

贵阳师院 西南师院

陕西师大 江苏师院

一九八一年九月

第四章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一节 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 一、抗日战争爆发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斗争。党的洛川会议
..... (1)
- 二、国民党战场及其大溃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18)
- 三、党关于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41)
- 四、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的斗争..... (54)

第二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为坚持团结抗战和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逆流的斗争

-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71)
- 二、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86)
- 三、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93)
-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百团大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103)

第三节 党为坚持抗战和巩固解放区而斗争

一、中国人民抗战的严重局面，党战胜困难和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129)
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139)
三、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153)
四、解放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168)
五、日寇的残暴统治和敌占区人民的反抗斗争	(179)
第四节 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184)
二、国民党统治的深刻危机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潮	(195)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07)
本章小节	(223)

第五章 全国解放战争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第一节 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革命策略	(225)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237)
三、党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	(258)
第二节 全面内战爆发。党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而斗争	

一、全面内战爆发。党关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264)
二、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271)
三、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第二条战线的出现	(280)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党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297)
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整军运动	(305)
三、十二月会议，党关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行动纲领	(314)
四、党关于各项政策的规定和加强纪律性的指示	(322)
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333)
第四节 伟大的战略决战。党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	(346)
二、党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美蒋反动派和平阴谋的被粉碎	(362)
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	(369)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	(376)
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392)
本章小结	(400)

第四章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一节 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一、抗日战争爆发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指导路线的斗争。党的洛川会议

【抗战爆发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在国际上，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至英法等国。新的危机给资本主义的震动比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要大。它的特点是在没有预先高涨与繁荣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旧病未好，新病又发，这就使得它比上次危机更严重，更难于克服。德、意、日三国先后发动侵略战争，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轨道，虽然还未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现象，但这种军需工业的畸形发展和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造成财政经济的崩溃。

日本帝国主义虽早已把本国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轨道，但是新的经济恐慌仍然笼罩着。同时，由于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据统计，1937年1月至5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比1936年全年七百次几乎增加了一倍；农民斗争仅1月至3月，就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用武力瓜分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把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外部，便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把吞并中国定为它的国策。1936年8月，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制定的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方针中指出：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①显然，这个所谓“国策基准”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增加军事预算和扩充军队。1937年，日本的国家预算由1936年的二十三亿元增加到二十八亿元，其中军事预算占百分之六十以上，陆军的常备人数，1937年内增至四十五万，1938年1月猛增至九十五万。海军人员，1937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工业计划，积极准备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侵略军携带实弹开往北平附近的芦沟桥进行所谓“演习”，并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搜索宛平县城，当地驻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本侵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

①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34页。

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我国驻军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爆发。接着，日本又从上海挑起事端。日本官兵二人驾驶军用汽车冲入上海郊区虹桥军用机场，并开枪寻衅，遭中国卫兵还击丧命。日军以此为借口，于八月十三日炮击上海闸北，我国守军奋起反击。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

一种力量是苏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站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给中国以财政上、军事上的援助。从1938年到1939年，苏联政府三次给中国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志愿航空队和其他军事专家来华对日作战，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等为中国的神圣抗战献出了生命。各国共产党组织亦响应共产国际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号召，在积极领导和推动本国无产阶级及各界人士声援中国抗日的同时，还以举行罢工、捐助、示威、抵制日货、拒绝装运军火物资赴日，组织志愿服务队到中国等实际行动开展援华运动。直接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有朝鲜的金日成及其率领下的朝鲜义勇军；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柯隶华；德国共产党员、“太平洋学会”的特约记者希伯；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被赞誉为八路军一员的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王安娜；以及日本的反战同盟等，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另一种力量是日本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国家。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长期执行着灭亡中国的方针，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德意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它们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36年11月，日德两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表示赞同这个协定。名义上是“反共”，实际上是三国的军事侵略同盟。这个法西斯同盟积极支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意法西斯对日本给予军事援助，并在中日之间以“调停”、“斡旋”为名，采取种种措施，威迫中国向日本投降。

还有一种力量，是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既不同于德意，又不同于苏联。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为实现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野心而发动的侵华战争，直接侵犯了他们在华的权益，威胁着他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当日本占领华北、进攻华中、华南，使英美在华的权利遭到更严重损害时，英美在一定程度上便扶助国民党政府，希望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帝国主义，削弱日本的力量。为此目的，英美在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给予中国一些援助。如一般地呼吁和平，给中国以战略物资为担保利息很高的少许的军事贷款和军需物资的供给等；另一方面，由于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剧增，英美既怕日本进攻他们，更怕中国人民力量的兴起。同时，德意两国在欧洲签订了反共协定，使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而日本在东方又多次对苏联挑起边境冲突，作出进攻苏联的姿态，求得英美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为应付西方局势，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企图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并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进步力量。所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日本总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希望日本与中国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事实上，英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扩大对日贸易，对日本在经济上、军需物资上不断给予帮助。1937年，美国输日物资总值为二亿八千八百

多万美元，1938年为二亿三千九百多万美元，在这两年之中军需物资占美国输日物资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一·二。美国向日输出的主要军需品有汽油、废铁、机器、铜、汽车及其零件、飞机及其零件等。在抗战初期，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军火库。在日本进攻华北、夺取武汉的这段时间里，英日之间也曾多次举行谈判，英国向日本出让他拥有很大经济实力的上海和广州等市场，英国首相张伯伦承认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事实状态”，并且表示无意妨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行为。英美帝国主义这种妥协退让和“不干涉”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勾结纵容日本帝国主义，助长法西斯的侵略。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泛的同盟者，能同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必须谨慎地对待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要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

抗日战争的爆发，在国内各阶级、阶层间也引起了不同的反映。

汉奸卖国贼是坚决依靠日本、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以少数亲日派为代表的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败类，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侵略爪牙。国民党统治集团长期推行的反动政策，也助长了汉奸的活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抗战开始，就积极鼓吹对日“和谈”，“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加强德意外交”，并

加紧同日寇密谋妥协投降活动；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他们就公开投到日本方面去了。但是，汉奸毕竟为数很少，且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连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得不在口头上加以反对。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全力抗日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生死存亡的问题，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中心支柱。芦沟桥事件爆发后第二天，长辛店的工人和附近的农民立即赶赴前线构筑防御工事、修路、运送伤员和各种物资。自7月19日开始，在上海，日本在华企业的中国工人发动了大罢工，以此抵抗日军的侵略。平汉线、正太线的铁路职工，也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恢复交通，保证运输。我党领导的民先队、北平学联、华北各界救国会等二十多个团体亦积极开展救亡宣传和支援军队作战。在抗战的巨流中，涌现出的群众救亡组织，如战地服务团、抗战救亡社等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工作。华北、华中相继沦陷后，地方党组织即领导和协同当地各阶层人民组织武装起义，转入农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些当地的人民群众武装与深入敌后的人民军队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一些地方实力派，是动摇于工农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间的中间势力。尽管他们同工农有矛盾，但由于他们在沦陷区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所以，在日寇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们也愿意站到抗日方面来同工农革命势力一道

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12月，沈钧儒与各党派爱国人士在汉口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邹韬奋主办的《抗战》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宣传实行全面的民族抗战、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抗战开始后，在政治上，中间集团都不同程度的要求民主，主张实行“多党政治”^①；在抗日上，他们主张“发动民众运动”^②，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③。这些都表明了抗日浪潮高涨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但他们对当权的国民党存在幻想，在蒋介石抗战宣言的迷惑下，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1937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效力抗战”。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勱和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曾经因为从事抗日反蒋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提出“少号召，多建议”，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要人们“多信托一些政府”。

国民党是个成分复杂的政党，其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基本上是英美买办集团。这个集团，既不同于汉奸又不同于抗日的人民。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个集团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

① 《益世报》社论《对六中全会的希望》1939年1月20日昆明版。

②③ 见施复亮《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文化战线》创刊号）1937年9月1日出版。

经济利益和反动统治，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由不抵抗转变为对日抗战；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进步措施，但他又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起来，动摇其反动统治，因而采取了抗日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政策：一方面，主张抗日，且在抗战初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此外，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太坏，对人民的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1937年7月底，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废除了民国紧急治罪法。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不给各抗日党派以平等地位，拒绝实行任何为抗日所需要的真正民主改革，极力反对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日的人民战争。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其他抗日势力，妄图假手日本军阀消灭之。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援助上，并幻想在维持其统治集团利益的条件下对日妥协投降，因而对抗战极端动摇。“七·七”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准备对日作战的谈话时，对日方仍然表示“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华北，江浙战事告急，蒋介石在江浙的统治已面临倾覆的危局，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已受到严重的威胁时，蒋介石国民党才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抗战。八月十四日发表国民政府声明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但是，在南京陷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和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仍然进行着多次妥协退让的秘密谈判。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太原等地后对国民党提出了更加苛刻的“和谈”条件；特别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时也由于英美等国顾及到国民党投降日本对他们的利益损失过大，因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才

不得不在1938年1月13日表示不按日方提出的新条件进行“和谈”。

日本用诱降的手段灭亡中国的阴谋落空以后，近卫内阁便于1月10日发表声明，叫嚷“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要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意欲更好地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投降。而国民党在此后也通过各种渠道同日寇保持秘密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蒋介石一直没有正式对日宣战。

国内形势表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已在中国社会中成为最主要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已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各阶级、党派、集团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除极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外，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抗日的，救国团体在全国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各阶级各党派亦有着不同程度的抗日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以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7年1月到1937年7月，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先后在南京、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和国民党政府就红军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改制以及国共关系等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8日，即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

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地区的共产党员与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又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红军也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指示各地党的组织立即与地方当局协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义勇军，扩大抗日运动。7月15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再次到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就红军的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再次进行谈判。同时，将我党中央在7月4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这个宣言提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时期奋斗的总纲领：即（1）“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宣言重申了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保证。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我党出席了国防会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督促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放弃妥协，实行抗战作了进一步的努力。

然而，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对抗日动摇，却一直观望拖延。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缄口无言，静候美英态度，直至七月十六日，美国发表了所谓芦事问题“和平”原则十六条，蒋介石才在七月十七日庐山谈话中表示准备抗战。他说：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对国共合作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却一再作梗拖延，对中共送交的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和约定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讲话，也迟迟不予发表。直到“八一三”上海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才在我党的批评、推动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御侮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1937年9月12日，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付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讲话。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教育和组织群众，发展抗日革命力量，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新的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3页。

条件下形成的，它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比较起来具有不同的显著特点：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阶层极为广泛，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别，因而统一战线在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内部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组织形式和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曾提出组织“民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曾提出了一个体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民族统一纲领》，以便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既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地位，又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拒绝组织有人民代表参加的国防政府，拒绝产生一个体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十大纲领精神的共同纲领。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始终不能形成巩固的抗日军事联盟，而且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可不受统一战线的约束，并任意加以破坏，继续坚持其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权和武装，但双方力量极不平衡。由于国共两党代表着对抗的阶级利益，而国民党统治集团掌握着全国政权，在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又处处统制人民的抗日行动，这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在发展军队和扩大抗